

当知识遇上信念

我们不应老想着让老祖宗为我们增光，应该多想想我们怎样为老祖宗增光。从来只有“光宗耀祖”一说，自古未闻“光子孙”之论。

王彬彬 著



当知识遇上信念

王彬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知识遇上信念/王彬彬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.1
ISBN 978-7-309-07350-8

I. 当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3319 号

当知识遇上信念

王彬彬 著

责任编辑/陈 军 卢 茗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05 千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7350-8/1 · 555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辑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

- 3 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
6 杂文与相声
11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
——漫说批评
18 作家的工匠化
23 我曾经是上帝
26 文学奖是……
29 文学奖的内与外
32 王朔：蹿到马路上了
35 知识与信念，过去与现在
38 这一座文坛，这一桩富贵
-

第二辑 与几种书的相遇

- 45 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
——说《鸡毛》
48 我喜欢汪曾祺，但不太喜欢《受戒》
56 《我与地坛》的小说嫌疑

- 63 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
- 69 比喻砌成的《围城》
——钱锺书对比喻的研究与运用
- 76 “在”而“不属于”两个社会
——读昆德拉小说《无知》
- 79 钱锺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
- 90 “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”
——董晓《乌托邦与反乌托邦：对峙与嬗变》序
- 102 革命与流氓
——读书札记
- 113 我与几种书的相遇
.....

第三辑 还要荒谬多久

- 119 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
- 123 何谓“素质教育”
- 126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
- 130 还要荒谬多久
- 134 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
- 137 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
- 140 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已不重要
- 143 季广茂事件与学术界的“潜规则”
.....

第四辑 学者之怒，诗人之忧

- 149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
- 156 也说“动物上阵”

- 160 骂鲁界里无高手
163 胡适、鲁迅与陈德征
168 鲁迅亲属与鲁迅
171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
186 写出的与未写出的
——《潘旭澜文选》编后
190 学者之怒与诗人之忧
——说说何满子与邵燕祥
194 柳亚子的“狂奴故态”与“英雄末路”
.....

第五辑 今昔中国

- 229 朱自清、闻一多与西安事变
233 邓拓与第一部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出版
237 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
241 汪精卫见溥仪——“木偶奇遇记”
244 1949 年以前中共的“统战工作”
248 为 1989 年版《辞海》送行
255 “文革”结束了吗
——与郝铁川先生商榷
261 今日中国的“群众性民族主义”
271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
274 中国人在日本
277 禁欲时代的情色
——“红色电影”中的女特务形象

289 后记

| 第一辑 |

在文学的名利场上

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

一种健康的商榷和驳难的风气,是学术界富有活力的表现,也是学术的发展所必需的。但这种风气在今日学术界却堪称稀薄。敢于与人商榷、敢于批评权威的,往往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初生牛犊,至于多少有了一点名望地位的人,则都显得很老成持重,对于自己明显不能同意的观点,对于那种自己认为非常荒谬甚至有害的说法,他们通常只是止于腹诽,或充其量与二三好友聊天时稍稍流露一点不同看法,要让他们公开著文与人商榷,那是决不肯的。这样,便不难见到这样一种学术现象:一种观点、一套理论、一番“创见”,尽管许多人都觉得很偏颇、很牵强、很不通,但由于是出自某个在学术界很有头脸的人士之手,便能在很长时间内畅行无阻,又由于很有头脸的人士总不乏吹捧者和追随者,这种观点、这套理论、这番“创见”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,被大学生一类学术辨别能力尚不够强的人所信奉。这种观点、这套理论、这番“创见”,虽然有时也会遭到初生牛犊的诘难,但这

种诘难毕竟因人微而言轻,难以构成强有力的挑战。

一个有头脸的人对另一个有头脸的人所发表的观点、理论、“创见”,实在忍受不下去时,有时也会公开表达不同的看法。但表达时却采取所谓“正面”的方式。尽管这种看法完全是由那自己所不能同意的观点引发的,但在行文中却极力避免将其作为对立面。换言之,这种“正面”的表达方式,就是尽量避免与不同的观点发生“正面”的接触、交锋,尽量避免显露出批评、争辩的色彩,要让人觉得他只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,根本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看法存在。这种“正面”的方式,当然比缄默不语要好得多,但其作用仍远不如在直接的批评、驳难中将自己的观点尽情表达。

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。倘若学术界的权威与权威之间都能在学术上坦诚相见,无须顾及情面地相互商榷、驳难,那对学术的发展真是莫大的幸事。这样的现象也曾有过。例如胡适当年对蔡元培的批评和蔡元培对此表现出的雅量,就永远具有示范意义。1921年,胡适发表了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,对“旧红学”进行了扫荡式的批判,而蔡元培正是“旧红学”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胡适一开篇就指出“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”。对蔡元培,胡适的批评也是指名道姓、直截了当的:“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,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。”“蔡先生……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,实在没有道理。”胡适的红楼梦研究,在宣告“新红学”诞生的同时,也为“旧红学”举行了葬礼。倘若胡适当年没有毫不含糊地批驳蔡元培等人的勇气,就没有红楼梦研究在当年的重大突破和发展。

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,胡适有太多的理由在蔡元培的“谬误”面前屏息敛声。从“利害关系”上说,其时的蔡元培是北大校长,而胡适是北大的一名教授。在今天,倘有哪位教授公开地、不客气地在学术上批评自己的校长,恐怕会成为一大新闻吧。

从私人关系上说,胡适是蔡元培延入北大并予以“重用”的,倘若没有在事业的起点上就遇上蔡元培这样的人,胡适恐怕也就不是后来的胡适。唐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曾说:“胡先生在他纪念蔡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说得很清楚。他说他底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,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。”在这种意义上,蔡元培对胡适可谓“恩重如山”。但胡适既没有考虑“利害关系”,也没顾及私人情义,只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。当然,胡适能这样做,既表现了他的学术勇气,也表现了他对蔡元培胸襟、人格的信任。对于胡适的批评,当时的蔡元培是并不接受的。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,面对自己的“属下”和晚辈(蔡长胡 24 岁)的挑战,蔡元培没有故作沉默镇静以显示矜持和不屑,而是也公开著文与胡适争辩。这表明,蔡元培也只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,并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、辈分和地位。这也表明,蔡元培确实是视学术为“天下之公器”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胡适对蔡元培红学研究的毁灭性的批判,丝毫没有影响作为校长、师长和“恩人”的蔡元培对胡适的看法和态度,丝毫没有损害二人之间的情谊。此后,蔡元培仍在不同场合高度评价胡适的“旧学”和“新学”。胡适在辞世的前一年,还满怀感慨地说:“当年蔡先生的《红楼梦索隐》,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。那时蔡先生当校长,我当教授,但他不生气,他有这种雅量。”(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)。在今天,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,扮演胡适这种角色的人,不但要被对方视作“忘恩负义”,也要被其他人说成是不知好歹吧。这说明,学术界的“生态”确实已恶化得极不利于学术的生长了。

不知蔡、胡等先贤的风范何时得重见。

2002 年 2 月 24 日凌晨

杂文与相声

把杂文与相声扯到一起,实在因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性。相声之不景气,久矣夫已非一日。现在,人们又在哀叹杂文的疲软。而这两者的命运之不济,有着相同的原因。

讽刺是相声的生命。对广大民众所痛恨的事情,进行尽可能巧妙同时又是尽可能辛辣的挖苦、嘲骂,是“相声艺术”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主要理由。当广大民众觉得相声演员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时,当广大民众感到自己心中的某种恶气、鸟气通过相声演员的表演得以抒发时,他们就会由衷地喜爱相声,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,而相声自然也就景气了。相反,倘若不能为广大民众代言,倘若总是逆广大民众的情感而动,广大民众就会唾弃相声,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“呸”声和“嘘”声,相声之不景气也就自不待言。举个例子吧,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,有一个相声是歌颂农民在今天的“幸福生活”的。那农民“幸福”到何种程度呢?“幸福”到住的是名副其实的“豪

宅”，家里是全套最现代的设施；“幸福”到开着宝马车来给过去接济过他的城里人送点“小意思”，而这“小意思”是一台笔记本电脑……这样的相声，城里人看了莫名其妙，他们见惯了潮水般涌到城里希图挣几个血汗钱的“农民工”，却没见过开着“宝马”给城里人送“笔记本”的“农民”。这样的相声，广大农民看了就更是满头雾水，不知是在说谁了。“三农”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今天最严重的问题，“农民真苦、农村真穷、农业真危险”算是说出了“三农”的真相。而那两个相声演员，却仿佛是在存心气观众，尤其是存心气农民。除夕之夜，这相声也看得我“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”。我最气的是，农民苦了一年、穷了一年、气了一年，这相声却让农民连个“瘦年”都过不好（近年有“肥年”一说，不“肥”的年当然就是“瘦年”了），不可谓不缺德。春节过后，在《南方周末》上读到杂文家刘洪波先生质疑这相声的文章，才算替我出了口恶气、鸟气。

相声倘若都去说农民怎样住豪宅、开宝马、把笔记本电脑当“小意思”送，那要景气起来，才真是见了鬼了。当然，我这里并无意把责任都推到相声编写者和表演者身上。我知道，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，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。那么杂文呢？杂文无疑也面临着和相声同样的问题。杂文的疲软，实在不能都怪杂文的作者和编者。如果讽刺是相声的生命，那么，批判就是杂文的灵魂。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，对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表现，予以不留情的批判，是杂文之所以必要存在的理由。换句话说，杂文的批判空间有多大，杂文的生存空间就有多大。而如今杂文的疲软，首先因为其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，这也像相声一样，自有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”的因素在起作用。但由于存在方式的不同，杂文的生存空间又无疑要比相声这类“表演艺术”大。从我自己的“遭遇”可知，如今杂文的疲软，与在报刊实

际掌文权者的眼光、胆气也有相当关系。直白地说,那些能够最终决定一篇杂文能否发表的人,对杂文的疲软现状也确实负有相当责任。

我偶尔学着写篇把杂文。一次,外地一位写杂文的朋友来电话,说是北方一家晚报要搞杂文大奖赛,那晚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是他的朋友,知道他与我相熟,便托他向我约稿。我的这位朋友再三叮嘱,要我一定写几篇,支持一下。不久,这位编辑又亲自来信催稿。我于是放下手头的“杂事”,去写杂文。先写了一篇《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爱心》,说的是如今各城市,在机动车道越来越宽阔平整的同时,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狭窄凹凸。文章当然对这种机动车道侵占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现象进行了批判。写完即寄出。几天后,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,说是某个曾任县委副书记的人,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进了监狱。在狱中,这名前县委副书记“痛加忏悔”,说自己刚当上副书记的那几年,还是“很廉洁”的,因为那时所收贿赂,“一年不过三五万元”。而这篇报道的作者,也完全认同这种贪官的逻辑,说他本来是“廉洁”的,一年受贿“不过三五万元”,只是后来“堕落”了,才一年受贿数十万元。这报道看得我两眼冒火,我于是在心中迅速地算账。我算出,三五万元相当于十个八个“农民工”一年流血流汗又流泪挣得的钱,相当于农民卖出十多万斤粮食所得的钱。我也想到我自己。我滥竽所谓教授之列,虽说如今“教授多如狗”,但好歹也是一条“教授狗”。而我一年的工资,也不过两万来元。三五万元,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了。可一个县委副书记,一个副处级干部,居然认为如果自己一年只收受贿赂三五万元,就堪称“廉洁”!这账,我越算越气,真所谓“野夫怒见不平事,磨损心中万古刀”。于是按捺不住地写了篇杂文,名曰《算法》,也就是把心中算过的账在文章中再算一遍。写完后又寄给了那家要搞

大奖赛的晚报。几天后,先寄去的那篇《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爱心》退回来了,那位约稿的编辑附了一信,寥寥数语,说明“上头”通不过。又过了几天,那篇《算账法》也退回来了,编辑仍附一信,还是被“上头”枪毙。我将这两篇文章“左看,右看,上看,下看”,觉得那“上头”的“心思真奇怪”。这样的文章都嫌犯忌,那您那杂文大奖赛,会办成个什么玩意呢?俗云:“东方不亮西方亮,黑了南方有北方”,我要看看到底还有没有“亮”的地方。于是将这两篇文章复印数份,不惜一稿多投,往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宁夏、新疆等地的报纸各寄一份。很快,这两篇文章在所寄各处都在醒目位置登了出来。那篇《算账法》还被《杂文选刊》选载。而杭州一家叫做《杭州工运》的刊物,又从《杂文选刊》上转载了这篇《算账法》,并且通过《杂文选刊》寄来了稿费。这刊物是由工会主办的,被这样的刊物转载,我分外高兴。

至今,也没有听说发表和转载这两篇文章的报刊出什么“事”。可见,有时候是“天下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”。每家报刊都有自己的“上头”,但“上头”与“上头”之间确实往往有云泥之别。有的报刊的“上头”,在办报办刊上,确实是十足的“庸人”。这类惯于自缚手脚的“上头”,有一个共同特征,就是把做官和升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好容易熬到了一个正处或副厅的官位,便十二分地珍惜,用鲁迅的话说,便“抖抖地把守饭碗”,唯恐“出事”而丢了乌纱帽。如果他们还不满足于现有官位而积极要求“进步”,那就更是每日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了。什么“三个代表”、什么“国家兴亡”、什么“党的威信”,这些,他们是从不考虑的,只考虑有生之年能爬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。——当杂文必须通过这样的人认可才能发表时,又怎能指望它不疲软呢?

所以,相声也好,杂文也好,它们的不景气,它们的疲软,都

首先不是一个相声和杂文自身的“理论问题”。这是仅凭常识就能明白的道理,探讨其不景气和疲软的原因,其实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。

2003年6月17日

在文学的名利场上

——漫说批评

《南方文坛》开辟专栏讨论“批评”问题，并命我也来谈一谈。说实话，我对这话题毫无兴趣。张燕玲主编问我为何无兴趣，我说对如今的所谓“文学批评”，只感到无聊，无聊得根本就提不起精神去说它。而张主编以为，这种无聊感也是对批评现状的一种反应，说说感到无聊的原因，也算表达了对批评的一种看法。并强调，只要是谈“文学问题”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什么人都不妨“骂”，不必有丝毫顾忌。张主编办刊物的热情和毅力一向为我所钦佩，她既然把话说到这种程度，我也就一时冲动，应承了。

在稍稍具体地谈论批评现状之前，我得说明一下，我对批评现状感到无聊，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年就没有一个不无聊的批评家，没有一篇不无聊的批评文章。诚实、敏锐而又富有学养的批评家还是有的，令人双目一亮的批评文章也还是偶尔能读到的。例如，李建军近年的一系列文章，诸如对贾平凹的批评、